译后记

本书的原标题是 *Saints and Scamps: Ethics in Academia*，直译过来是“圣人与无赖：学术界的伦理”。这里的“圣人”与“无赖”指的是大学教师当中存在着的两种极端情况:既有像圣人一样严格要求自己,恪守职业及学术伦理的大学者和教育家;也有非常自私，对学生、学术以及学术共同体不负责任、枉为人师的渎职者。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尊称品德至善、有大智慧的学者为“圣人”的习惯，但几经斟酌还是希望能在中文版的标题中用更接近中文习惯和现实的词来体现大学教师中存在的普遍情况。我的朋友袁建博士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君子与小人”。大学中确实不乏谦谦君子，不过“小人”在中文中通常与品行低下、阴险狡诈相关，似乎言之过重。我最后选择的“顽童”更接近“小人”的字面含义。同时英文里的 Scamp 也有调皮捣蛋的小孩的意思，书中提到的不少负面例子中的老师也的确具有“顽童”的特点：以自我为中心，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随心所欲，想一出是一出，这可能也是个别老师比较准确的写照。

另外，我也改写了一下副标题以更准确地反应书中内容的侧重。说到学术伦理，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学术造假、抄袭以及作者争议等。这些问题在学界及媒体上都讨论得比较多了，在本书中也有所涉及，但是这并不是书中的重点。本书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系统地梳理了大学教师的职责，特别是在教学、科研、服务等方面应尽的具体义务和相应的制度设计。在我看来，其内容更多的是关于大学教师的职业伦理。就像律师、医生一样，大学教师也有源自职业的基本职责，而这些具有多面性、稍显复杂的责任，往往是大家关注比较少的。因而我特别在标题中强调了职业伦理，也可避免读者对于本书内容有错误的期待。

本书的作者卡恩教授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专长是伦理学，同时也有长期在国际顶尖大学担任系主任、教务长和副校长实践。我个人特别喜欢他用哲学论证的方式，讨论与大学教的行政经验。他的这本书完美地结合了他的专业知识和管理师职责有关的核心概念以及可能

的制度安排。很多职业伦理及学术伦理的介绍中往往只说“应该”怎么样，但是不能坦率地讨论“为什么”和“为什么不”，而这样的讨论确实需要基于对相关的概念做深刻的剖析。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书中的讨论不仅仅停留在很抽象的层面上，还结合了大量的类比以及具体或假想的例子，并给出了具体甚至可操作的建议，可以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实践。例如，书中在讨论如何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的时候，令人信服地反驳了完全依赖学生评价的教学评估方式。很多人可能会将现代高等教育看成是学生购买大学的教育产品，所以作为“消费者”，学生似乎有权利和能力对购买的服务做评价。但是就如卡恩教授指出的，这种类比忽视了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性。首先学生之所以来大学学习，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相关的知识。可以做个类比，虽然餐厅的顾客即使是初次品尝某种菜肴，也可以评价食物是否对他来说比较美味，但是却无法评价菜肴的营养价值、是否地道或者能不能做得更好，而这些恰恰是需要营养师和美食家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评判的。类似的，评判一门课上得好不好，学生能看到的只是表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老师讲得是否流畅、清晰、有趣味，是否让学生觉得有收获，但是要看课程覆盖的内容是否得当或者介绍的知识或观点是否准确客观，则需要同行去听课才能评价。当然，学生也并非是只通过付出学费就可以换取毕业证书的消费者，学术的标准不会根据学生的意愿发生改变，教师有学术上的权威，需要客观地评价学生，而过分依赖于学生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评价，会引入不必要的利益冲突。

回到本书的翻译，一个既有趣有时又有挑战的事情是在如上的严肃讨论中，卡恩博士还会时不时穿插一些非常幽默的评论或者辛辣的讽刺，比如他在 25 周年纪念版自序中建议那个抢人失败的哲学系聘用亚里士多德：反正他和他们想聘用的明星教授一样都不会出现在校园里，但却更有影响力。有些也涉及英语中的特有的双关，比如书中提到的关于 _“Myron Fox 博士”（我译成“胡麦农”）用堆积看似高深的专业术语忽悠高级知识分子的实证研究等。当然，还有一部分翻译的困难来源于一些词在中文中没有特别合适的对应。比如说文中

多次提到的 integrity，其实是西方知识界极其看重的一种学者的重要品质，它不仅仅是诚实，还包括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信守承诺等诸多高尚道德品质的统一，但在中文中就没有一个单独的词可以囊括。还有一些文中提到的概念、机构和制度在中文中也没有特别通用的对应。比如美国针对 liberal arts 的本科教育(文中翻译成“博雅教育”),特有的liberal arts college（文理学院）以及 B. A. 的学位并不适合从中国人习惯的文理分科的角度来理解（参见文中相关的译注），同时也并不简单的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通识教育”。书中作者花了较多篇幅谈与此相关的全校统一的毕业要求，这可能对国人来说就会有些陌生。另外书中后半部分涉及决定校级事项的教师大会，在中国的大学里也很少见。

尽管如此，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非常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的，很多正反面的例子都能在我们身边找到实例。要注意，本书的第一版是在 1986 年出版的，我们能看到当时美国的学术界也有我们现在很挠头的问题，其实很多我们遇到的问题即使目前在国际顶尖名校也是广泛存在的。就像卡恩教授在 25 周年纪念版自序中说的，本书出版后的很多年里，他所担忧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退步了。但同时，我们也能从本书中获得一些前车之鉴。

比如，中国各大顶尖高校正在逐渐引进美国的预聘-长聘（tenure）系统，但在美国提出这个制度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基于保护学术自由的考量，也需要其他制度相配合。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为所用”制度的表面，也应该了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制度，以及如何避免可能的问题。

另外，书中的有些观念，可能会和我们传统上对于教师的预期有所不同。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会希望教师们与学生“亦师亦友”，而且要关心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卡恩博士强调“成为哥们儿”的教师并不能保持客观的判断。在现代的西方大学里，可能会更倾向于建议教师与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being friendly without being friends”（有

友好的态度但不必是朋友)，学术上的专业关系是在读师生间唯一合适的关系，这也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作为译者，我还特别想推荐书中的附录里的几篇文章，那里提到的一些制度，即使在中国还没有对应物，其实也值得了解，比如广受在美华人争议的“平权行动”，卡恩博士介绍了它的两种不同解释，并比较了利弊，这对了解机会公平的实质很有帮助。

阅读和翻译本书对我而言还有重要的实际价值，这得益于卡恩博士对诸多和教师责任有关的制度的详细介绍。他不光告诉我们为什么，还具体谈了应该怎么做。例如，书中关于教师招聘的流程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讨论，是我在协助系里制定相关流程时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们系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招聘得以按照国际标准顺利进行。当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一些书中没有提到的困难，但是书中提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澄清的概念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可以说，这是一本对高校的中层管理者非常有实际帮助的书。

最后，我想回到翻译这本书的初衷。在中国学术界，很多学术伦理和职业伦理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特别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当然，情况在逐渐变好，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逐渐形成共识，至少可以意识到相关问题的存在，可以避免犯下无心的错误，或者成为学术不端或渎职的受害者。但是要让学术及职业伦理成为培养研究生的重要环节，并且要让这些未来的高校教师真正理解伦理规范背后的原因，在实践中摸索怎么去处理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现实情况，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系统性的公开讨论和相应的课程，光靠导师的言传身教很可能是不够的，因为不可否认有一些教师自己并没有做得非常好，而且在对学术共同体以及院系的服务义务上，学生也一般无从知晓。在这里，卡恩博士是值得羡慕的，因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老师——理查德·泰勒教授。我想翻译这本书的初衷正是因为当时看到卡恩博士写理查德·泰勒教授帮助他的故事，那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而这也正是本书正文的最后一个例

子，推荐大家都看一下。从卡恩博士的经历来看，好的老师会影响学生的一生，甚至会影响到学生的学生。希望同学们都能碰到他们的“泰勒教授”，当然，更希望我们老师自己也能成为学生们的“泰勒教授”。

致谢：

感谢袁建博士、王瞳先生、刘佶鑫博士以及编辑田炜女士、赵阳先生在本书的翻译及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建议。

王彦晶

北京大学哲学系

2020 年 8 月